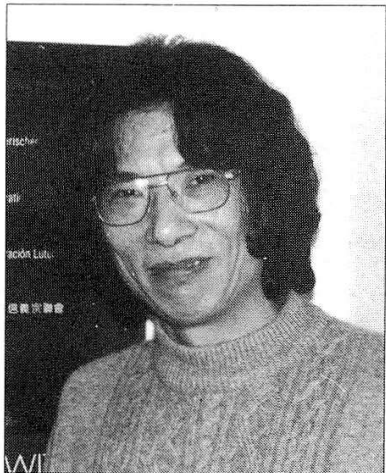


關於中國基督宗教藝術處境化現狀的浮想

何琦

可以考證的基督宗教藝術的歷史已約有一千八百年了，可以考證的中國基督宗教藝術的歷史也約有一千三百多年。但是橫隔在中西方之間的差異在於：由西亞傳入歐洲的基督宗教，自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頒佈《米蘭敕令》並大事興建教堂以來，基督宗教藝術便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主流文化社會；而由西亞傳入中國的景教，從大唐貞觀至元代（元代時稱「也里可溫教」），卻絕對地處於文化邊緣地帶。

明末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曾發動了衝向主流文化社會的努力，後因種種原因而事倍功半。及至十九世紀「傳教黃金時代」，基督宗教伴隨著鴉片戰爭的硝煙而大規模地進入中土，「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那沿著東南海岸多座高高聳立的哥德復興式教堂，是被視為帶有侵略意味的異質文化象徵看待的。義和團鏟滅「洋教」的行為在一定的歷史



時期內，是被看作「愛國主義」行爲而被謳歌的。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佔領了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並將其變爲「造反司令部」，圖書館館藏的無數經典書籍在熊熊燃燒的烈火中瞬間化爲灰燼，那高高飄揚在教學樓頂上的大幅標語是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詩：「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筆者在首屆中國基督教藝術研討會上發表《基督教藝術本色化的歷史與現狀》的演講，當筆者以幻燈片方式展示出羅馬早期基督徒墓窟中手駕戰車、項披七道霞光，酷似阿波羅神像的年青英俊的默西亞基督像；酷似早在公元一世紀便流行於尼羅河流域的「衆神之母」伊西斯的手抱聖嬰餵奶的聖母坐像；特別當筆者展示出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畫派的金髮聖母、威尼斯畫派筆下豐腴的聖母和作爲原型的畫家寫生素描時，

- 觀者無不爲之動容：「啊！原來被我們視爲最正宗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基督教藝術，竟也是當時意

大利藝術家本土化的產物。」似乎有一種過去被蒙蔽的感覺。

筆者曾花不少時間遠赴歐洲考察中世紀藝術，萬般感觸地發現：歷經千年的歐洲中世紀基督宗教藝術，實際上也就是完成了歐洲基督宗教藝術本色化的過程。隨著十五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這個已被歐洲化包裝的基督宗教便被傳往海外，致使許多海外殖民地民衆誤以爲基督宗教不過是「歐洲人的宗教」。

去年筆者曾赴美國訪問和考察，對美國當代教堂建築的神學思考感受良多。一些新建的教堂，單從其外觀來說，實在「不像教堂」（相對於傳統意義而言），內部設計也與歐洲中世紀教堂大相逕庭。爲此，我和索維克先生（Mr.Sovik）——一位在美國現代教堂建築運動中頗具影響力的建築師，著有《爲崇拜而建築》（Architecture For Worship）一書——進行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討論。

按索維克先生的觀點：傳統中世紀拉丁十字型

平面設計的教堂，「人爲地在教堂——神的居所裡，劃分出人格不平等的空間秩序」。我對他說：「我在歐洲看到的中世紀聖伯爾納德所倡導的西多會隱修院教堂的内部空間仍被『一分爲二』：東部屬於聖人（修道士們）；西部屬於俗人（平信徒）；中間有門牆分割開。」這位年近八十的老先生有些激動：「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堂！在教堂，神的居所裡，就應該體現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索維克先生領我去參觀當地一座由他所設計的教堂，在這座外表「不像教堂」的教堂裡，洋溢著現代集中式的向心力與親和力。在明尼阿波里斯，幾座「不太像教堂」的教堂中，平日堂內有活動籃球場、藝術展覽、專供兒童遊戲或老人談心的場所，到星期天做禮拜時才重新組成爲禮拜用的講台，就是在這樣的臨時講台上，牧師們手抱電子結他帶領大家高歌流行曲調的現代讚美詩。這一切不由令我想起，基督對彼得的教訓：要把教會建造得像磐石一樣堅固——像磐石一樣與社會取得聯繫，而不

是高高在上，冷漠古板，令人望而生畏。

當我回到國內，又遇見拿著教堂設計圖紙前來「請教」的地方教友，在他們的「新教堂」設計圖紙中，仍擺脫不掉對十九世紀哥德復興式的模仿。我對他們建議：「能不能去掉這些哥德式的小尖塔呢？」（我還沒有向他們解釋這中世紀哥德式小尖塔的來由：十字軍東征時受伊斯蘭清真寺外四個方位的宣禮塔啓發出的靈感。）

「但……若是去掉尖塔，信徒們會認爲不像教堂啦！」他們回答說。似乎在中國，只能允許存在一種教堂模式——十九世紀外國傳教士所帶來的哥德復興式。

一個星期前，江蘇省江陰地區的兩位牧師前來登門。江陰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現在因爲富裕了，故興建一座教堂。兩位牧師想請我爲他們的新教堂前廳畫一幅壁畫，我向他們展示我的一幅畫作《基督和他的門徒》，是去年曾用作世界信義宗第九屆大會的主題畫，但我看到兩位牧

師面帶難色：「這幅畫……它太中國化了，信徒們還是比較喜歡類似達芬奇『最後晚餐』這樣的作品。」我深知這兩位在基層工作的牧師沒有說錯甚麼。我也知道達芬奇的「最後晚餐」是件舉世名作，但是能夠模仿這幅畫的人多的是，就不需要我再去湊熱鬧啦！

生命的存在是有限的，作為中國基督教藝術家，我只能抓住短暫易逝的生命去做一件事：奮鬥於中國基督教藝術本色化的事工（也怕做不好）。我只想做一件不同於達芬奇及其時代的事，只做屬於自己時代的事。我想起魯迅曾經說過的一段話：

真正的藝術家不要去做公民團的首領，而要去引路的先覺。

站在世紀之交的轉折當口，我更願意面向未來，而不願意一味去迎合。我深知，探索者的命運一向多坎坷，往往「高處不勝寒」。但我還是願意去做我的阿基米德定律。我想起不久前，丁光訓院長曾對我說：「我之所以要你留在金陵神學院教課，乃

是希望今後從這裡畢業的神學生能夠跟得上時代的發展，能夠參與當代文化的對話。」

幸好在這幾個學期，願意選修我課的同學挺多，雖然只規定二、三年級的同學可以選修（每年級一班），每次選修我課的同學總在六十人左右，幾乎可以坐滿整個偌大的教室。

這就是說，我的努力還有希望。因為，從金陵神學院畢業的學生是面向未來的——他們面向廿一世紀。

□